

紧扣时代脉搏的思考

——《宁波日报》“对话”选萃

◆ 李磊明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紧扣时代脉搏的思考

——《宁波日报》“对话”选萃

李磊明 编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紧扣时代脉搏的思考——《宁波日报》“对话”选萃

李磊明 编著

责任编辑 王大根

封面设计 徐雪松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9490-382-2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理论宣传“三贴近”的有益探索

——宁波日报理论谈话栏目“对话”评述

(代序)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阅评小组

理论宣传如何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进一步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吸引力,有效拓展理论宣传的空间,使理论宣传在更大、更广范围内发挥作用,需要积极创新和努力实践。宁波日报理论专版“学苑”对此作了可贵的创新探索,收到可喜的成效。

“学苑”的“对话”栏目邀请理论工作者、各级领导和实际工作者,立足宁波,采用对话体的形式,评点、剖析社会当前广泛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统一认识,促进工作。“对话”每月推出一至两次,已坚持办了近三年时间,已成为宁波日报理论宣传创新的一个新亮点。2005年6月,中宣部发出《关于介绍推荐理论宣传工作好做法的通知》,“对话”栏目作为理论宣传的创新做法,被省委宣传部列为我省的两份推荐材料之一,上报给中宣部。2006年3月,中宣部在《宣传工作》上刊登的《贯彻落实“三贴近”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理论宣传好做法好经验情况综述》一文中,也对宁波日报“专栏求新求活”的理论宣传思路作了充分肯定和介绍。

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践和理论上都会形成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对话”采取主动介入的积极态度,已先后就接轨上海、建设生态宁波、让失地农民共享城市化成果、宁波未来发展

的新动力、关注“农民工”、发展慈善事业、破解“择校”难题、创建平安宁波、构建和谐社区、建设节约型社会、迈向创新型城市等问题，组织刊发了专题文章。这些文章既正视问题，分析原因，讲清道理，又指明了出路和方向。及时、准确、通俗易懂地阐明和宣传了中央、省委的重要精神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在解疑释惑中统一了认识，促进了工作，使理论宣传更好地发挥了引导群众、掌握群众、推动群众的作用。

办好“对话”栏目，除了主持人要有一定的理论素质和了解实际情况外，选择参加对话的嘉宾更应注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结合与平衡。如“对话”曾推出《城市也是他们的家园——关注“农民工”》专题，五名嘉宾包括宁波大学、宁波社会科学院、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三位专家学者和宁波市就业管理局、宁波市教育局的两位有关同志。整个专题根据 2004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关于“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观点准确，论理深刻，令人信服，有较高的理论含量；又结合宁波实际，摆事实，想对策，重点突出，现实性强，有相当的政策含量和信息量。正因为“对话”寓理论性、政策性于一体，兼具新闻性和知识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讲得比较透彻，达到了既宣传了理论，又指导了工作的“双赢”。

为了增强理论宣传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话”在版面编排、标题制作等方面都作了努力。编排上力争图文并茂，版面经常配以与主题相关的彩色照片，并对“主持人语”套上色块，以美化版面，增强读者阅读的愉悦感。在标题制作上也较精心，推出了一些既能突出文章主题，又很“抢眼”的标题。在“主持人语”的写作上也是下了工夫，让人读起来很亲切，有一种作者和读者“面对面”拉家常的感觉。

（原载《报刊动态》2006 年第 21 期）

目 录

审视“非典效应”	1
接轨上海:历史·障碍·重点	7
宁波:建设江南水乡特色的生态城市	14
“失地”农民:共享城市化的成果	21
打造宁波先进制造业基地	28
宁波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35
老外滩:打造宁波的第五张城市名片	42
浙东学术文化:与时俱进 历久弥新	49
塑造城市特色 展现城市魅力	55
城市也是他们的家园	61
人才强市:引领宁波发展	68
以人为本创新城市管理	74
关注“人文社区”	80
迎对“汽车社会”	87
破解“择校”难题	94
科技竞争力:领跑宁波经济发展	100
建设“平安宁波”: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06
慈善事业:社会因你更温暖	112
“以民引外”:加快推进正当时	120
让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	125
全方位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131
传统节日,亟待重视和复兴	138

建设和谐社区: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145
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长	151
认识休闲 引导休闲 发展休闲	158
广场文化:展现城市文明的窗口	164
理性看待专业的“冷”与“热”	170
建设节约型社会:宁波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76
宁波经济:踏上科学发展的新平台	183
让更多企业家成为慈善家	190
创造性地传承优秀民俗文化	198
繁荣发展宁波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206
依法维护群众利益和信访秩序	214
交通发展:构筑经济社会大动脉	220
开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227
解读“81890 服务模式”	238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雷锋精神	244
宁波,更好地迈向创新型城市	251
综合治理商业贿赂	258
聚焦“公交优先”	264
积极实施“中提升”战略	270
品牌建设寻求新突破	277
城市,让市民更健康	284
会展业助城市腾飞	292
推进行业协会健康发展	298
附录:以谈话栏目拓宽理论宣传的读者面	305
后 记	311

审视“非典效应”

主持人:李磊明

嘉 宾:邓小河(宁波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李 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

陈正良(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仕龙(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主持人:“非典”是一场灾害,也是一面镜子,它给整个社会一个反思的平台。在这场公共危机中,大到建立应急机制、政府公开透明、责任意识的增强,小到人人勤洗手、吃饭分餐制、不随地吐痰,都有可喜的革新和进步。人们把这些新气象、好作风称之为“非典效应”。然而,人们欣喜之外也有担心,这些“非典效应”会不会随着“非典”的终结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殆尽?会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一些老毛病又会死灰复燃?请各位就此展开讨论,发表意见。

政府管理变革的契机

邓小河:在抗击“非典”期间,各地政府一改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冲破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革除画地为牢的体制掣肘,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非典”初期的被动局面,政府管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行政效率提高了,干部作风变好了。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举,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称赞。但是,既然非常时期是暂

时的,那么“非典”过后,这些非常措施会不会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政府管理的新气象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这个问题确实令人深思。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应当以这次抗击“非典”为契机,着力从体制、机制深层次上推进政府管理变革。

——健全公共行政机制。现代政府作为“有限政府”,主要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提升 GDP 指标,而且要制定公共政策,保护公共环境,维护公共安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人民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考核经济发展主要是用 GDP 指标,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这次“非典”疫情带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就是按照新的发展观要求,健全公共行政机制,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在防治“非典”的关键时刻,有两部法规格外引人注目,一部是于 1989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为政府抗击“非典”的措施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另一部是刚刚实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为防治“非典”工作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为什么一部老法律和一部新法规会如此受人关注?这正是我国法治进步的直接体现。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要求政府不仅在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严格依法行政,而且在“非典”过后的正常时期仍然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尤其是要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手段来调控社会的能力。

——扩大行政公开性。这次防治“非典”的实践表明,如政府及时发布“非典”疫情等一些公开透明的做法,有利于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树立政府良好的公共形象。近年来,推行政务公开,政府部门公开一些办事制度和程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行政公开性仍然较为有限,尤其有关公共事务方面的重大决策透明度还不高,民众还缺乏

应该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对此,我们应当以打赢这场“非典”战役为开端,从体制制度层面进一步扩大行政的公开性,着力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众知情与参政的各项民主权利。

确保公众知情权

李伟:随着“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反思在这场“非典”流行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而这其中一个尤其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确保公众知情权。所谓公众知情权,是指公众对重要决策和政府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要保证公众知情权,就必须切实充分做到政府信息公开,这也是适应 WTO 政府信息公开性和透明性规则的基本要求。

长期以来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藏官府,威严莫测”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害怕一旦公开有关信息就会损害当地政府或领导的形象,往往习惯于垄断行政公共信息并对政府决策实行暗箱操作。

如果公众不能及时得到相关权威的公共信息,各种“小道消息”、“传言”甚至“谣言”就会大行其道,反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比如,在这次“非典”中所出现的板蓝根、白醋价格飞涨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更有甚者说放鞭炮可防“非典”,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各级政府采取严格的报告制度并及时发布各种疫情相关信息时,政府和公众形成了良性互动,“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得到了有效引导。

但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光靠行政手段、道德力量或舆论监督还远远不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使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调整。这方面广州 2002 年公布的国内第一个《政府信息

公开规定》和不久前国务院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都进行了有效的尝试。

虽然这些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等级还较低,内容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经过这场抗“非”斗争的洗礼,只要把“非典”时期在信息公开方面一些有力的做法和措施,保持并且发扬下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确保公众知情权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大家共同负起责任来

陈正良:“非典”事件,对我们各级政府和全体公民是一次社会责任心的检验。在2003年5月中旬召开的“世卫”大会上,吴仪副总理坦陈:在疫情发生之初,中国政府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向国际社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并在此前此后以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在国际上和民众中确立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与此同时,在这次抗击“非典”的特殊战斗中,我们这个社会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忠于职守、以忘我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的优秀人物和感人场面。从各级政府官员、医务人员到普通社区干部,就是这些千千万万忠于职守的人们构筑起了一道抗击“非典”的坚固长城。

要有效战胜像“非典”这样一些对人类的新的威胁挑战,需要依靠科学,需要物质条件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挑战的态度、精神状态,尤其是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人们能否有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一种责任意识。

当然,社会主体各自责任的落实更需通过制度与法治的保障: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政治问责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保证重大公共事务及时有效的处理,并进而促进吏治整肃、政风改变;通过制

定社会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以规范在各种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来临时人们的行为和管理,以避免像“非典”发生初期曾一度产生的被动无序;通过加强社会公德的法制化,强化人们对诸如不能随地吐痰等基本行为的养成,并进而把人们从许多教而难改的习惯陋习中矫正过来。

不让陋习卷土重来

王仕龙:“非典”期间,民众的公共卫生习惯、个人卫生习惯、饮食习惯等都有了可喜的改变,许多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正在逐步取代昔日的陋习,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要彻底纠正我们几千年以来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不良生活习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要多管齐下,绝不能让已经被纠正的陋习卷土重来。

必须加强立法,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同时要加强执法,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改变各种不良恶习,改掉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在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公共卫生上存在的各种陋习。同时,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形成讲卫生、讲文明光荣,反之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以促进全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社会公德。

此外,政府还要加强维护公共卫生秩序、养成良好社会公德的硬件设施的建设。例如,在公共场所多设一些生活废弃物回收箱、公厕等,使人们更方便地处理好各种废弃物,促进人们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当前,对消费娱乐行业场所,包括餐饮业、宾馆服务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容易发生传染性疾病的场所,要尽快制定细致、详尽和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并加强宣传和执法的力度。比如,中国饭店协会的《餐饮业分餐制实施条件与服务规范》的出台很及时,但主要还是要抓好这些规范的执行。

我相信,只要通过社会各方的努力,措施到位,“非典”给我们的卫生、生活习惯带来的诸多好的转变,一定会长久地留在我们身边。

主持人:诚如大家所言,“非典”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机遇,它促使我们在付出高昂的学费和成本后,也开始了自省、自警、自励,人们已经看到,变革已经开始,新的气象已现端倪。

危机往往是转机的前兆,综观中外古今,每一个民族的觉醒,国家的强盛,莫不受益于各种各样的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对危机进行认真反思、总结,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只要认真反思,科学总结得失,都是一笔有益的成果,把“非典”成果巩固住,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宝贵的财富,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大有好处。我们要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奋起改革,以“非典”作为变革的契机,着力从体制、机制深层次上推进变革,把在抗击“非典”中体现出来的好作风、新气象、好习惯,持久地保持和发扬下去。

(原载《宁波日报》2003年6月10日“学苑”版)

接轨上海：历史·障碍·重点

主持人：李磊明

嘉 宾：王光龙（宁波市政府协作办副主任）

叶文涛（宁波市经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方照强（宁波市接轨上海工作办公室处长）

主持人：主动接轨大上海，全面融入长三角，是宁波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赢得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将加快接轨上海的步伐，增多宁波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无疑，这是一大利好，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宁波如何接轨上海做科学的分析和定位。所以，回顾接轨上海的历史渊源，分析宁波接轨上海的障碍因素，研究接轨上海重点领域的选择，尤显必要。

接轨上海的三次高潮

方照强：宁波和上海地域相邻，人文相近，人缘相亲，历史上宁波人曾多次大规模迁移上海，谋求发展，在近代上海金融业、加工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发展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和“上山下乡”浪潮中，两地人民助贫帮困、同舟共济，当时宁波市接纳来自上海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的知青就达 2 万多人。所以说，沪甬两地之间的合作，既是近亲睦邻

式地域、亲缘和人文关系的产物,也是区域经济互补互利发展需求的结果,两地之间有着深厚而牢不可分的合作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与上海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从阶段推进看,接轨上海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宁波市农村经济的变革和上海知青返城后亲属式的扶持,为沪甬合作提供了契机,发展近亲睦邻间的合作关系,接轨形式是以零部件加工、委托加工和星期天工程师为主,依托上海的资金、设备、工艺、人才、技术、信息、营销渠道等优势,使宁波市乡镇企业在此后10年间迅速兴起、发展和壮大。调查表明,当时宁波市80%以上的乡镇企业以及农村农民的从业、温饱转型,无不与来自上海的师傅、订单、市场有着直接的关联。接轨的成果是宁波形成了轻工、服装等加工制造业基地,为宁波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次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全面启动后。宁波市委、市政府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依托上海、接轨浦东、发展宁波”的战略思想,并于1996年8月专门成立了市接轨上海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这从省内或从全国来看,宁波市都是先走一步的。围绕大机构、大项目引进,对近期或中长期合作方向做出了部署。

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市场运行机制的结合,这一阶段接轨上海合作内容与合作形式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政府的合作参与,促成了一批对宁波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落户。除20世纪90年代初“长发集团”投资合作外,宝新不锈钢一期建成投产,二期工程即将完成,三期工程已经启动;以上海方为主,采取国内BOT形式,总投资为4.7亿的常洪隧道,目前已建成通车,这一项目直接来自上海的投资就近4亿;沪甬合作兴建的如开发中心、技术创新园区等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技术开发机构全市已有几十家;上海的高校、科研机构为宁波培养和输送了

大批人才,为宁波市“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宁波的不少企业和产品通过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一次高潮,使宁波充分借助上海经济、信息等资源优势 and 接受上海产业转移,初步形成了宁波在长三角南翼地区及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三次以 2002 年 7 月,宁波市党政代表团成功出访上海为标志。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2002 年 7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与宁波市黄兴国书记、金德水市长两市高层领导的会见、会谈,为新世纪新一轮沪甬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次出访期间,上海市韩正市长和宁波市金德水市长分别代表两市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书》,同时在会上签约的还有沪甬两地 37 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签约,对两地经济的互动发展,尤其对宁波市经济的带动具有重大意义。今年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实质性启动,必将为宁波市主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翻开新的篇章,为宁波新一轮发展带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

破解宁波接轨上海的障碍因素

叶文涛:首先,要克服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摒弃画地为牢的封闭思想。

宁波与上海是两个不同等量级的城市,宁波不应该也不可能与上海开展全面的竞争,必须依托上海产业、金融、科技、人才等资源优势,为宁波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也正因为是不同等量级的两个城市,所以存在比较大的合作空间,在一些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互补态势。

接轨上海,为宁波加快国际化进程提供了一条新渠道。在前一轮接轨当中,我们已经滞后苏州、无锡等苏南城市。在长三角经

济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关键要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以思想观念的开放、融合为先导,充分认识上海是我国加入 WTO 后率先接轨世界经济的桥头堡,把积极主动接轨上海,作为宁波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以极大发挥宁波的区位、产业和体制优势,达到既增强宁波的综合实力,又从整体上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共赢。

其次,要克服“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体制及其相关政策的制约。随着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宁波接轨上海,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机会将进一步凸现。从长江三角洲城市来看,虽然各地都在加紧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积极接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龙头,但其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更多的是从本区域出发,而没有从一体化或联动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如浙江省提出“加快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使之成为接轨上海,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件好事,特别是对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相关城市而言,预示着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他们都提出了依托环杭州湾产业带,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规划设想。然而,比较其内容,尤其是产业选择方面,在与上海“错位发展”过程中又出现新一轮严重的趋同现象,电子通信、石化、汽车及零配件、日用家电等产业成为各个城市纷争的对象。另一方面,行政区划体制的制约会进一步强化利益本地化,抬高市场进入壁垒,阻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无形中提高了市场运营成本,对区域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个极大的破坏,这充分说明现行行政区划体制的刚性作用依然很强。因此,必须建立起宁波和周边城市与上海经济互动机制,达到既能克服目前体制障碍,又能提升整体经济效能的双赢目的。

从宁波来看,企业接轨上海意识和行动远比政府来得早而快,这也恰恰体现了宁波民营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在接轨